

## “双一流”建设笔谈

[主持人语] 中央决定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为“双一流”。什么是“双一流”，为什么要建“双一流”，如何建“双一流”，本刊约请五名学者对此进行笔谈。

(王善迈)

[关键词] “双一流”；高等教育；大学；学科

### 励精图治、厚积薄发、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钟秉林

2015年10月，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颁布，明确了“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建设与改革任务。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印发，明确了“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的遴选条件、遴选程序、支持方式和管理与组织实施。2017年4月，“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首次会议，对遴选标准进行了审议。《方案》与《办法》是在国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先后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基础之上的完善与深化，是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举措。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关键在于大学认真抓好内涵建设和综合改革，在教育观念和治理体系、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有所突破。

#### 一、教育观念与目标定位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更新教育观念是重要先导。一是要树立

---

[收稿日期] 2017-05-05

[作者简介] 钟秉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先进的教育观和教育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二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坚持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和速度(节奏)协调发展。三是要重建富有时代特色的人才观,重构符合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发展规律的多样化的质量观。四是要树立现代的教学观,坚持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选择,鼓励学生兴趣特长的发展和全面素质的养成。学校定位既要具有一流意识,又要坚持实事求是。要瞄准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找准定位、各安其位、特色发展、多样化探索,切忌盲目攀比、同质化发展。发展目标要体现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办学定位,反映学校对于社会需求和国家战略的适切性,符合教学科研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并考虑到学校的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并做到内涵清晰、表述准确、体现特色,在校内形成高度共识,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 二、培养模式与质量保障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一流本科教育是重要基础。要坚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彰显学校优势特色的原则,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首先,确立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根据学校定位和学科专业特色优势明确培养目标,并在此基础上从优化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满足社会特定需求的角度明晰人才培养规格。其次,加强专业建设。构建科学规范的专业体系,完善专业准入和退出机制,重视专业内涵的调整。第三,优化课程体系,重视能力的培养。从学生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整体优化的角度,平衡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夯实学科基础与加强技能训练之间的关系;兼顾系统性、前瞻性和实用性,不断更新教学内容;重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养成,合理安排教学实践和职业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意识。第四,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利用互联网技术,探索个性化、多样化教学,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结合学校实际,探索基于问题的学习、研讨式学习、案例教学等探究式学习方式。第五,加强教学建设。加大经费投入,树立精品意识,抓好课程和教材建设,重视实验室、实习实训和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第六,加强大学内部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建设,完善质量标准,优化指标体系,改善评价方式,强化评价结果的反馈和改进机制,注重学生学习效果和资源使用效益的考评,提高质量保障体系的有效性。

### 三、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具备精良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保障。在人力资源建设方面，一方面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要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如年龄、学科、职称、学历、学缘、地缘结构，以及专兼职和“双师型”教师结构等；要关注新挑战，加强师德建设，倡导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坚持学术规范，教学科研相长，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要关心教师的生活待遇，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努力形成体面生活、开心工作、在竞争中成长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要加强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倡导精干、高效、专业、敬业，不断增强管理人员为教师学生和教学科研服务的意识，并通过系统培训和问题研究提高他们的专业化水平。在物质资源建设方面，要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多种渠道筹集办学资金，建立规范的财经、资产管理制，发挥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率。要加强办学条件的建设，包括办学空间拓展、基础设施建设、图书资料添置、仪器设备更新、后勤管理服务，以及校园信息化建设等。

### 四、国际视野与交流合作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要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其基本特征是师生资源和教学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跨地区流动，以及现代教育理念、先进培养模式、教学管理模式和学生事务管理模式的跨国传播与融合。要抓住机遇，科学借鉴教育发达国家的办学理念和成功经验，在弘扬本国高等教育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探索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实践，培养国际化人才，产出国际水平研究成果，既要体现“世界标准”，还要坚持“中国特色”。双向互动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生命力所在，在鼓励我国高校师生多种形式“走出去”的同时，要吸引更多外国学生到中国高校学习，引进更多国际人才到中国高校任教；在鼓励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进入中国教育市场的同时，要推进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国际拓展，在境外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 五、治理体系与运行机制

科学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制度保证。一是完善大学领导体制，这与政府治理、大学内部权力格局和学术生态密切

相关,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二是实现校务公开和信息透明,落实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发挥师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证社会知情权和公众问责权。三是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优化大学组织结构,调整学术和行政治理结构,改善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效能。四是加强制度建设,包括人事聘任和考核制度、教学和学生管理制度、学科和科研管理制度、财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常态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等,通过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 六、校园文化与育人氛围

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是一所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积淀、人文品格和价值理念。大学文化内化于大学的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学术品位,外显于大学的制度规范、行为方式和物质条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师生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大学发展方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内在支撑。要高度重视大学文化建设,不断优化学术氛围和育人氛围,为人才培养和学校健康可持续发展营造优良的文化氛围。大学文化建设要贯穿于学校发展的全过程,努力形成学术自由的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的文化、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文化、价值宽容的多元文化和全球视野的开放文化。当前,要把加强社会责任感养成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最后应该指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是一个动态的积累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不断积累,没有捷径可循。“双一流”建设成功与否,不是靠行政发文“认定”或领导人讲话“宣布”,也不是靠学校自我“宣称”,关键是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学科建设水平和办学声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教育主管部门要制定科学的遴选和评价标准,建立公平竞争、动态调整机制;高等学校要放平心态、遵循规律,避免急功近利,依靠广大师生员工,把主要精力和财力物力投入到内涵发展上去。笔者相信,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我国一批大学和学科一定会脱颖而出,屹立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之林。

## “双一流”政策的关键词分析

谢维和

在贯彻落实中央深改组、国务院与教育部等部委制定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以下简称“双一流”)的各项政策中,准确与全面理解其中若干关键词的准确涵义,领会其精神实质,澄清某些想当然的模糊认识,对于有效地进行“双一流”建设,实现其目标,是非常关键的。其中,“一流、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三个关键词的分析与说明,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 一、“一流”是水平概念,不是层次概念

首先是“一流”的概念。尽管人们可以对所谓“一流”的内涵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界定,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研究国际交流等等,但对于“一流”究竟是一个“层次”概念,还是一个“水平”概念,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就在我自己与某些学者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时,其看法就截然不同。从严格意义上说,这里的“一流”表达的是一个办学水平的概念,反映的是教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高质量。它不应该是一个层次的概念。这是“双一流”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问题。

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看,水平与层次是非常不同的两个概念。“层次”讲的是高等学校的服务对象的差异。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系统中,这种层次往往体现为国家重点大学、省级重点大学、地方大学,或者研究生、本科生或专科生,等等。它们在人才培养的层次、服务对象,以及建设目标等方面都是不同的。客观地说,这种层次的差异是必要的,它也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需求的体现。而所谓的“水平”,表达的是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与产品所达到的质量状况,它反映的主要是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教学质量的高低,特别是他们所提供的服务或产品是否能够适应特定服务对象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显然,这种“水平”对不同层次大学的涵义是不一样的。简单地说,国家大学的水平应该是满足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特别是研究型 and 拔尖创新人才的要求;而地方大学的水平则应该体现在培养各种其它类型人才,特别是具体的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上。两者都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它们的评价标准也是不同的,不能简单的进行比照。而且,两者之间也是不可替代的,各有其独特的优势与价值,高层次大学并不能完全替代低层

次大学的功能；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往往不一定能够胜任应用型大学的要求。所以，层次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不同高等学校的办学取向与定位。

由此可见，高层次不等于高水平，低层次也不等同于低水平。高层次可以是高水平，也可能是低水平。不同层次的大学都可以达到一流。如果一所高层次的大学不能很好地为其利益相关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它也就是低水平的。同理，只要那些低层次的大学能够为他们的利益相关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也就可以是高水平的大学。大学是如此，学科也是同样。不同层次的学科的服务对象也是不同的，关键仍然是你的产品与服务质量。因此，“双一流”建设的目标不能仅仅是高层次的大学，而应该选拔和支持那些高水平的大学，它们或者是一些高层次大学，也可能是一些低层次的大学，但它们都能够有效满足不同人才的需求，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这样，才能真正激励不同层次的大学努力办出水平，切实注重学生的成长幅度与科研成果的水准，以及社会服务的效果。显然，如果在“双一流”建设中仅仅关注高等学校的层次，则是对“双一流”政策的一种片面理解，而且会在实践中对学校的建设产生一种片面追求层次的导向。

## 二、“世界”是具体概念，不是抽象概念

什么是“世界”？这个耳熟能详的概念其实非常的抽象与空泛。按照有关工具书的解释，世界包括一切事物，指地球的所有地方，等等。然而，当我们仔细品味近年来中国人，甚至是高等教育界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世界”理解为欧美国家，把“世界一流”等同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其实，这也是一个有些片面的认识。应该说，世界也是一个包含不同国家地区的一个整体性的具体概念，欧美等发达国家是世界，第三世界国家也是世界；欧洲是世界，亚非拉也是世界。换句话说，“世界”本身是一个包含不同地区的具体概念。这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有一次，我带领清华大学的代表团去老挝出差，访问老挝最主要的一所大学，向他们介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情况，特别是清华大学的情况，包括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政策，等等，希望这所老挝的国家重点大学能够选拔优秀的学生到清华大学学习。然而，就在我介绍了清华大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情况以后，这所大学的校长却告诉我，在他们的心目中，云南和广西的某些大学就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而且，他们与这些大学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每年都向这些大学派遣许多留学生。听完这位校长的话以后，我心里非常的感慨。而且，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也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其实，只要一所大学能够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能够成为这个区域的优秀青年人和大学生向往的大学，它就是世界一流大学。

实际上，那些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都非常关注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十分重视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和引领。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曾经听到有些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就非常关心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改革与进展。他们请巴西里约热内卢等地方的官员和学者，介绍各个地区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他们也希望我介绍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某些情况，等等。由此也表明他们对“世界”的认识。

对“世界”这个关键词的这种具体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和有现实意义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当然应该建设若干所能够与欧美等世界强国的一流大学媲美或竞争的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但同时，我们也同样应该强调和关注中国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即应该认真考虑在不同地区，包括在东南亚地区、在中亚地区，在印度洋地区、在南美和非洲等地区，建设一批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大学，提高中国在这些地区与国家的声望和引领作用。这对整个国家的全球化战略，以及全面和充分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发挥中国的大国作用，都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中国的某些地方大学，特别是与周边某些地区与国家具有特殊的传统关系，包括文化关系、地缘关系、族缘关系，以及血缘关系等，或者是已经形成某种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大学，也应该成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对象。如果仅仅关注欧美，将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走向世界的战略布局是不利的。

### 三、“高等教育强国”是结构概念，不是排行榜概念

“双一流”不仅具有“985工程”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任务，而且还有“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所以，双一流就不仅是若干所重点大学的事情，而是全国高等学校的事情。然而，当人们提到“高等教育强国”时，常常会想当然地联系到如今各种大学排行榜，也非常自然地把在这些排行榜中的TOP100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而且，往往也会非常在意一个国家的大学在TOP100中的数量与地位，并且将进入这种所谓TOP100的大学数量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指标与依据。这种想法和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能够进入排行榜的TOP100，当然意味着某个大学或某些大学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而进入其中的大学数量也能够反映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水平。因此，中国的“双一流”建设，当然需要建设这样一批能够稳定地居于TOP100的大学。否则，我们没有理由和底气宣称自己是高等教育强国。

但是，这样的看法和认识也并非是全有道理的。因为，TOP100的大学

及其数量只是高等教育强国的必要条件，而并非是它的充要条件。一个国家并不能只是依靠若干所排行榜中 TOP100 的大学就能够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实际上，世界上有一些在不同领域非常著名的高水平大学与学院等，并没有进入到这些排行榜里，如艺术领域的俄罗斯列宾艺术学院、设计行业的顶尖学府罗德岛设计学院，等等。而近年来一批学术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号称小常春藤(Little Ivies)的美国东北部一批顶尖文理学院，包括威廉姆斯学院、艾姆赫斯特学院、卫斯理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明德学院、鲍登学院、科尔比学院、贝茨学院、汉密尔顿学院、哈弗福德学院等，更是成为了年轻人非常向往的大学。而且，有些美国的州立大学虽然整体上没有进入排行榜的前列，但它们的某些学科却是世界著名，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某些学科，等等。而另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则是德国的高等教育，尽管排行榜中德国大学的名次并不如英美大学那么显赫，但德国大学的整体水平却不能不让人佩服。而且它的整体结构与布局也非常的合理，对德国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高等教育强国并不是一个排行榜概念，而是一个结构性概念。这种所谓的“结构性”概念，指的是，高等教育强国应该是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人才需要，适应与引领不同地方与行业的发展，以及支撑国家和地方不同战略的实现的高等学校与学科的整体。而且，这种不同的“满足”、“适应”和“支撑”之间能够相互协调，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优势。所以，真正的高等教育强国应该是既有那些在排行榜中进入 TOP100 的研究型大学，也有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高水平大学；既有顶尖的培养博士的大学，也有一流的本专科大学；既有著名的学术型大学，也有名牌的职业教育大学；既有具备学术影响力的一流学科，也有形成了行业影响力的一流学科；既有基础研究领域的重点学科，也有应用技术方面的前沿学科，等等。它们彼此呼应，相得益彰，形成一个能够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群众需要的综合性的高等教育体系。而从高等教育理论上说，这种高等教育的合理结构正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体现与基本指标，也是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特征。正如一个人的颜值取决于他或她的面部五官，以及身体发育的匀称一样，一个高等教育强国的整体质量也取决于它的结构性优势。也正是因为这样，国务院的“双一流”文件中非常明确地指出，“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强总体规划，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加快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的规划要求。

中央和国务院的“双一流”方案是一个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创新性政策，需要深入与历史性的理解与领会。而关键词的科学认识将直接影响“双一流”的成功实施。



## “双一流”：是什么、为什么建、怎么建？

沈 红

按照官方的说法，“双一流”指的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双一流”建设是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需要。但关于怎么建设，近日来讨论诸多，最多的则是“建设名单”。

笔者自1993年始研究美国研究型大学，尽管不直接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但25年来一直都在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场域中，近几年也花大力气专门探讨研究型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异同。可以说，“世界一流大学”一直存在于我的学术世界里。

“双一流”看上去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事，但又不止于此，因此任何人都可对此事“说长道短”：决策者从国家利益的高度谈其重要性，评价“211工程”和“985工程”及其对中国一流大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从政府视角展望“双一流”建设的前景；办学者从学校利益的角度说其必要性，好大学必须走向一流，弱势高校也需借“双一流”东风来“去弱增强”，“中流”高校要从“一流学科”建设中分得“一杯羹”；社会人（包括学生家长）可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呼吁其应实现性，富裕家庭送子女自费出国留学，贫困家庭子女靠聪明才智挣得奖学金以实现留学抱负，若有中国自己的“双一流”，子女可在国内“成龙成凤”；在校师生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描述其必要性，因所在学校的地位影响甚至决定着师生个人的生涯发展。总的来看，各类人员都可参与有关“双一流”的讨论，因此，讨论热烈且意见多维，但目前来看其思考层次尚不够深透。

笔者认为，“双一流”建设是需要准备的，先有准备，再有建设过程，才有建设成果。也可能“三段间”有部分重合，但“非常必要的准备”必须在“建设过程”前到位，“明显可见的成果”必须在“建设过程”后取得。正因为“双一流”是非常不容易建成的，所以才不是由政策文件、数据报告、竞争演说、入选名单汇聚起来就形成的。本文仅回应三个基本问题。

### 一、什么是“双一流”？

“一流”是纵概念，first-class 或 first-rate，可以称为最好的一层。一流不是排名中的第一，不是序位上的，因此不是唯一的，当然也不是很多的。当

---

[作者简介] 沈红，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我们说“一流歌唱家”时，说的就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各自唱法中最优秀的人。这种对最受欣赏、最吸引人的人和事物的判断，是最“没有道理可讲”的、是感受上的、定性的，是无法用数字表现的。“一流”也是横概念，存在着比较的范围。理论上可有世界一流，地区一流，国家一流等。由于国家概念是国际概念形成的基础，从政治、法律、行政等制度体系的角度看，国家是最合适于比较的独立单元，可以把国家层面的一流大学作为世界层面一流大学形成的基础，因此得出“一流大学”比较的范围最主要的是在国家层面和世界层面。综合“一流”的纵横概念，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最受人欢迎和推崇、最吸引优秀人才、人之最向往的大学，也就是世界人们心目中最好的大学。无论排名者用数字将其排在什么位置，都无法降低人们对这些大学敬仰的程度。世界一流学科也具有相近定义，只不过其概念边界是学科，或为学科门类，或为学科领域，即专业。

## 二、为什么要建设“双一流”？

近30年内，中国一直在努力建设本国的好大学，也鼓励中国的好大学积极参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竞争，成绩是显著的，但差距仍然是明显的。评价过往的经历，改善战略与策略，尽快成就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成为目前最大一项政策选择。建设“双一流”，不仅是从高等教育规模上大国走向高等教育水平上强国的需要，也是从人力资源大国走向人力资本强国的需要，还是在国家发展速度上高等教育发展匹配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的需要。对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始发于20年前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社会各领域的发展都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更多人教育层次的提高无疑增强了凝聚到个人身上的人力资本，更多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为科技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教育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关注教育公平和强调教育效率的矛盾性、大众化与精英型高等教育的协调性等等，都带来了相对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水平来说的高等教育高水平发展上的滞后。人数不少的最优秀的一批精英青年仍到国外求学，创新科学中仍较少来自于中国的大学，前沿引用和借鉴仍大量来自外文翻译，大学中的去行政化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教学科研服务关系改善都仍然举步维艰。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地设计并执行“双一流”建设，完善中国高等教育的体系建设，成就“一流”，提高“二流”，警示“三流”，对“不入流且拒绝提高的高校”实行“被合并”或“转制”或“关门”的方式，迫使其在“毁灭中重生”。

### 三、怎么建设“双一流”？

首先要厘清建设的对象。什么是大学？横向看，大学是多学科构成的高等教育机构；纵向看，大学既从事本科教育也从事研究生教育；从职能看，大学既有教学又有科学研究。因此，大学至少有三个特性：学科综合、实施本科及本科后教育、从事科研。对照来看，学院是可授予“第三级教育”学位的教育机构，或是大学中的一个部分，或是提供职业教育的机构。<sup>①</sup>从国际口径上看，大学与学院只在一个基点“教育机构”上相同，其他方面很不相同：学院不像大学那样提供“高等教育”而提供“第三级教育”或“职业教育”；学院不像大学那样具有多学科、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在中国，2006年的《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对198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进行了细致的标准化。学院：可拥有1个学科门类，全日制在校生从3000人变为5000人以上，新增了对专任教师的资历要求。大学：需要拥有3个学科门类以上，全日制在校生从5000人变为8000人以上，新增的要求涉及到专任教师资历、教学成果奖、科研成果奖、科研经费数、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学科等，还涉及到土地和建筑面积、仪器设备、图书、实习实训场所等基础设施的数量。从中国口径上看，大学与学院的差异主要在于学科数、在校生数、教师资历、教学和科研获奖、科研经费数、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学科数、以及基础设施数量上。比较而言，中国对“大学”的规定过于具体、强调量化、具有政策影响的时效性。同时，“学科”的中外划分口径也不同。我国有13个学科门类，其下分为110个一级学科，往下细分是392个二级学科；美国相应的数据分别是17、38和362，且“交叉学科”和“职业技术”进入到美国的学科门类中。比较中外学科划分口径后发现，中国口径过于细致狭窄，特别是一级学科的数量：中、美、加、日、英分别是110、38、49、49、20<sup>②</sup>。要知道，“双一流”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如果我们规定中的“大学”和“学科”都只是遵循中国的“游戏规则”，不与他国的大学和学科在一个口径上说话，怎么形成世界将认可和尊崇的“世界一流”呢？

建设“双一流”还需要丰富的资源。搞清楚“什么是”和“为什么建”仅在理念层面上提供了资源准备；给“大学”和“学科”以限定是在对象层面上提供了资源准备；笔者提出“三力”：人力、财力、制度力，是强调条件层面上的资源准备。中国建设“双一流”的人力资源是丰富的，但若把这些集中

<sup>①</su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llege>.

<sup>②</sup>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12：《中外学科划分情况比较研究》，《科研简报》9月11日。

于高等教育界的学术人力资源转化成学术人力资本，我们大学教师的世界声望要提高，大学生的学术准备要加强，行政人员的管理服务要更有效，只有拥有由高声望教师、高潜质学生、高效率行政人员所综合构成的人力资本的大学和学科，才能吸引世界精英群体的关注与交互行动。在财力资源上，尽管2017年度财政预算超过100亿元的大学达7所，但相比于既存的世界一流大学来说，我们的财力仍需加强，除了增加科研经费和捐赠经费之外，还需要增强大学的学术创新创业形成的“造血功能”；更为需要的是，做到“金钱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联姻，使大学学术人力资本最大化。最后谈及“双一流”建设需要强大的“制度力”。我们目前讨论的“双一流”，只是一项提高高等教育水平的政策，政府的主导很容易转化为大学的行动，但毕竟尚未进入制度层面。而制度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加固或者摧毁已有的人力和财力。所以，在“双一流”建设之初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制度”，这个制度应由多个微观制度所合成，如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学科制度，学术自由与学校自治制度，学术评价制度，学生培养制度，学术薪酬制度等。

## 学术发展与功利主义

阎凤桥

功利主义之于学术发展，具有双重作用效果：从积极方面看，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外在激励，可以促进学术的发展；从消极方面看，当功利主义使学术行为偏离其应达致的目标时，则会对学术进步起到抑制作用。中国学术发展亦受功利主义的影响，有正负两个面向的表现。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学术在许多发展指标上正在快速增长，且有跻身于世界前列的预兆；另一方面，学术不端行为的滋生与蔓延，败坏着学术风气，腐蚀着学术肌体的健康。

对于一项公共政策而言，制定者的出发点常常是善意的，并且遵循一定的公义原则而提出，即使有例外，也多是不自觉为之。但是，政策执行效果究竟如何，则往往不是政策制定者能够完全控制的，并且经常超出其理性预期范围。对于一项具有经费和利益等实质意义的政策来说，利益相关者既可以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去理解和应对，也可以从非功利主义角度出发去理解和应对，取向不同，效果则相异。这是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种普

遍现象。就我国政府2016年推出的“双一流建设计划”而言，政府的意图无疑是良好的，但是可以预计，实施过程中难以避免“非预期后果”的出现。实际上，功利主义的倾向早已露出端倪，这从高校对待第四次学科评估的态度及作法就可以略见一斑。政府似乎也已经觉察到这种不妙的倾向，在调整该计划的实施策略。

从表面上看，“双一流建设计划”中功利主义行为的始作俑者是高校，因为问题看似出在高校身上，即为获得资源好处，违背政府的意志，有华而不实的行为倾向。这种看法其实是偏面的，有失公允。实际上，功利主义倾向的形成，绝非高校一方的责任，而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功利主义风气弥漫当下，我们可以从多个利益主体角度对此进行检讨。从中央政府方面看，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本身就包含着功利主义的色彩，“一流”而非“优异”，不只是术语上的不同，而是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更会带来行为上的差异。“一流”的目标是明确和需要考核的，要求高校用证据证明专项经费投入带来的效果。该项政策的形式和内容，势必会引起功利主义的反应。在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办学格局下，虽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所属院校，但是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也不甘示弱，为了促进本地高等教育的发展，设立了地方配套项目及其财政经费予以支持地方院校和属地院校。在“双一流计划”问责机制作用下，各种大学排名机构和作法应运而生，虽然目前社会上对排名结果及其作法争议不少，但是，人们仍然津津乐道，似乎缺少了这个部分，就无法检验项目的实施效果，也无法回答经费投入“物有所值”的问题。与媒体所采用的简单学校和学科排名作法相比，半官方性质机构组织的学科评估做了很多改进，力争兼顾主观与客观评价方式、数量与质量指标、总量与人均指标、研究与教学指标等，消除偏颇，但是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可能出现的以偏概全和行为导向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客观易行的评估工具，量化评价方法比较适用于某些学科，比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些学科（如经济学），但是不适用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的另外一些学科（如人类学）。即使在适用于量化评估方式的学科之间，论著发表数量的含义也是有差别的，不宜唯数量而抹杀有创造性的工作。从社会角度看，这种向少数重点学校和重点学科倾斜的非均衡（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非公平）发展方式之所以获得社会的接受，不能说与想要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梦的国民心态没有一点关系。当然，功利主义行为倾向表现最为明显的行动者是高校，在“双一流”评选大战之前，已见“硝烟”。试想，哪所高校领导不想挤上“双一流”这班快车，否则就是失误和失职，不仅在经费获取上落后，而且在引进人才和招收学生上都会处于长期不利的地位。如果在这场项目竞争中名落孙山，学校领导无法向全校师生员工交代。于是乎，我们看到的情形是，高校领导拭目以待，高度关注中央的政策动向，运筹帷

握，采用“田忌赛马”的策略进行参评学科的优化组合，不问青红皂白地合并甚至撤销那些看上去缺少评估竞争力的学科。这种竞争压力，从学校层面传递到院系层面，再传递到教师个体层面。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赤裸裸的功利主义的场面，学术工作应有的自由、从容和儒雅氛围消失殆尽。

显然，功利主义行为的负面结果，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形。不论政府和高校今后在“双一流建设计划”中采取何种博弈方式，我们都希望可以有一些抑制功利主义消极效果的力量，避免该项目成为高校争夺资源的恶性竞争。但是，它又是难以摆脱的困境，因为我们生存在功利主义“铁笼”之中。推而广之，功利主义不仅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性的普遍问题，在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学术资本主义”就是功利主义在学术领域表现的一种说法，其含义是学术逻辑要服从资本的逻辑，在这种服从关系中，学术行为会被扭曲。另外，英国学者斯诺(C. P. Snow)用“两种文化”来描述科学对人文的傲慢与偏见，或者说学科的细分造成画地为牢的狭隘主义行为倾向。在更早一些时候，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将此困境阐述为，普世性的价值系统被“数目字化管理”的工具理性搞得分崩离析。

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目标的国家相比，中国社会的功利主义倾向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当下的功利主义表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儒家有修己的传统，但是自元代以降，读《四书》已经不是为修己，而是为了考科举、成功名。到“五四”时期，国人学习西方，只注重科学和民主这些有形的内容，而缺少对西方思想观念和文化的深入了解，同时也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于是出现文化的真空，造成功利主义盛行。自20世纪始，中国进入了现代化发展期。与其他后发外生型国家一样，中国面临着现代化中的“失序”问题，即在器物、制度和文化的三个方面，器物层面发展速度要快一些，而在制度和制度和文化方面发展则相对滞后。这种失序加剧了功利主义的行为表现。今天，官民都意识到这一点，开始提倡和致力于核心价值观的重树，旨在解决上述失序问题，但是由于其滞后性，要想成为指导我们行为表现的力量，尚需假以时日。

如果说功利主义是一种世界性“通病”的话，有没有什么可能的治疗办法呢？历史学家余英时在《中国文化的重建》一书中指出，西方国家也有功利主义，但是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宗教的道德抑制；二是“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这可能正是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如何改变知识外驱性与内驱性之间的关系，是解决当下学术功利性问题的一种可能途径。在普遍悲观的情形下，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扭转偏离学术轨道问题的尝试和经验。比如，北京大学2016年成立了促进人文和社科交流的平台——人文社会科学院，在成立仪式上，邓小南院长提出要“涵养学术”的宗旨，学校领导也承诺提供良好的学术研究条件，不提附加要求，不用绩效指标加以考核。另外一个例子是，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雪光告诉笔者，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在引进教师时，不看发表论文的数量等“普通规则”(normal size)，而是看其有无特质和有无新意，那怕与实用性和功效性无甚干系。总之，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形下，提倡一些“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和作法，即使无法彻底消除功利主义的负面影响，但仍然有益于营造一些“微小生态”(niche)，匡正学术风气，从而促进学术“百花园”中纯粹型学术的发育和成长。

## 对“双一流”建设的几点思考

陆根书

国务院在2015年11月5日对外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具体任务和发展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7—8日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也明确指出：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党中央做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决策，就是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家启动实施的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战略，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战略举措，它既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的必然要求，也是在我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要在世界舞台上展露实力与自信，并率先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必然要求。

正是由于“双一流”的重要性，能不能拿到搭上“双一流”的船票，不仅成为众多高校十分关心的大事，也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自国家“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推出以来，各地出台了许多“双一流”建设支持计划，高校也通过各种努力争取进入“双一流”名单。然而，对“双一流”如何定位与遴选，是否需要照顾区域高等教育平衡，是“普惠”还是“扶优”，是扶持地方高校建设，还是助推中国名校走向世界等等，还存在许多争议。对其中有关问题，我有几点不成熟的思考，就教于大家。

---

[作者简介] 陆根书，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

## 一、“双一流”建设要坚持世界一流和中国特色

陈宝生部长提出，“双一流”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它的定性就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标准是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有机融合。坚持世界一流和中国特色，才有利于将“双一流”建设引向正确的轨道。一方面，“双一流”需要与国际接轨，用国际可比的指标来衡量，因此强调“世界一流”标准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因此，“双一流”建设不能简单地强调对标国际，照搬“世界一流”标准，还需要以中国特色为统领，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强化“四个服务”意识<sup>①</sup>，同时要考虑建立有中国主导的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为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提供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为我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 二、“双一流”建设要“评”“建”结合

在根据世界一流和中国特色标准“评”(遴选)高校和学科时，还应该考虑“建”的因素。有些高校、学科，可能根据世界一流的标准来衡量，还达不到要求(事实上，目前我国还没有一所高校声称已经达到世界一流、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国家战略需要，培养一流人才需要，我们仍然应该加强建设。从历史的经验看，我国一些一流学科甚至一流机构，有的当时甚至是一张白纸，但根据国家需要建设起来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仍然有许多与世界一流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国家急需建设的学科领域，对这些学科我们应该加强建设。在这种意义上，从国家战略需要出发，我认为“双一流”建设也应该考虑区域布局问题，对中西部、东北地区一些居于国内一流的高校和学科，在政策上给予重点支持和倾斜，将其纳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计划，并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以防止和避免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失衡的进一步加剧，以便“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学科的学术水平、人才队伍建设能够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建设需求相结合。

---

<sup>①</sup> “四个服务”是指“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 三、“双一流”建设要回归初心，坚持立德树人，培养一流人才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的职能不断扩大，逐步由人才培养扩大到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但高校之所以称之为高校，人才培养永远是其首要的职能。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

有的学者或管理人员认为，既然“双一流”要坚持世界一流，遴选高校与学科时，就应该参考目前国际上几个影响比较大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排名，ESI等。从培养一流人才的角度看，在“双一流”建设中如果片面强调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排名的作用，可能会引导教师和高校把精力用于能得分的一些科研显性指标上，使教师无心于教书育人，使高校远离培养一流人才的本分。这是因为，目前一些影响力较大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例如上海软科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QS和《泰晤士高等教育》的世界大学排名、《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世界最佳大学排名，虽然都把世界各地的大学放在一个涉及范围较广但有限的国际可比框架内，利用在全球可以收集、比较的一些信息和数据，对世界各地大学的水平进行了比较，但并不能真正客观、精确地测量大学的整体水平<sup>①</sup>。这些排行榜都比较多的考虑了高校某些特定方面的职能，如科学研究(即使如此，也并没有尽可能综合地考虑所有学科的所有研究活动，以及所有类型的投入、产出，研究的数量和质量，研究产出所有类型的应用及其影响，研究对教学、地区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等)<sup>②</sup>，对人才培养以及高校的整体功能缺乏综合考虑。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目前还缺乏国际可比的数据基础；即使在排行榜中考虑了人才培养或教学方面的内容，采用的常常也是替代性的指标，如用师生比来替代性地测量高校教学质量的高低，这就难以真正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估。因此，在遴选“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时，如果把世界大学排名、ESI等作为遴选的国际标准甚至唯一标准，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误导，甚至扭曲办大学的宗旨，对一流大学的功能作狭隘化的理解，导致大学立德树人，培养人才价值的迷失。

<sup>①</sup> 陆根书、罗继军，2016：《世界大学排名与一流大学建设》，《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第1期。

<sup>②</sup> Marginson, S., 2014, University Rankings and Social Sci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49(1): 45-59.

#### 四、“双一流”建设要有利于促进良好的高等教育与学科生态的形成

“双一流”建设方案出台后，各地区和高校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也展开了多方面的热烈讨论。但以往的讨论考虑外在的要素投入、遴选评价体系多，对高等教育和学科发展的精神内核关注少，导致一些地方的“双一流”建设实践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例如，采用行政化的工程或项目配置机制，行政主导色彩浓；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强调不同类型高校、学科良性互动，和谐共生不够，不利于实现高等教育和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大学是一个“既以学科为基础，又同时存在学科多样化”的“知识集团的联合体”<sup>①</sup>。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需要有健康和谐的高等教育与学科生态环境为其提供基本的条件和保障。<sup>②</sup>

(责任编辑：刘泽云 责任校对：刘泽云 孙志军)

~~~~~  
(上接第 122 页)

academic performance, arts students have higher College English Test-6 scores, are more willing to join the party, serve as student leaders and persue postgraduate study. In terms of employment developmen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choice of industries, employment units and jobs between arts and science students, and science students have much higher starting salary. The ability of science students can be tested more effectively by the labor market.

**Key words:** the division of arts and science; college performance; employment development; employment wage

(责任编辑：孟大虎 责任校对：孟大虎 孙志军)

---

① Weick, K. E., 1976,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Loosely Coupled Syste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1(1): 1-19.

② 陆根书、胡文静, 2017: 《一流学科建设应重视培育学科文化》, 《江苏高教》第 3 期。